



第一章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衝突

在台灣，人們每天唯一感受到不是來自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大概可以說是天氣。當我們八月初到達時，氣溫遠高於攝氏 30 度，濕度更是超過 90%。台灣是一個熱帶島嶼，在島上的悶熱是明信片上無法感受的。如果可以的話，盡可能就待在家裡。如果您必須出門，可以從有空調的地方到另一個有空調的地方。我們降落在台灣南端的商業城市——高雄國際機場，昔日的一個漁村。過往的風貌現在只能在海港區中體驗，高雄如今已成為大都市。高雄擁有約 270 萬人口，是南台灣第一大城市。城市景觀大多由購物中心塑造出來。這些購物中心不僅是台灣，也是亞洲的購物天堂。可能是由於天氣的原因，地下室或較高樓層通常為餐廳、小酒吧和速食連鎖店。因此，人們實際上是在冷氣下的商業中心度過他們的空閒時間。學校大概是唯一沒有經由空調控制溫度的地方。

安德魯在上課的第一天就經歷了汗流浹背的體驗。台灣的公共建築通常在庭院中設有遮蔽的人行道。每層樓介於室內和室外之間，都有開放的樓梯間和通風的走廊。這在建築上很吸引人，但考慮到氣候，它不是很實用。悶熱的時間持續到十月，然後天氣才變得稍微舒適。直到四月，較為舒適的溫度仍可高達 24 度，至少在該島南部是這樣。十月到隔年四月這段期間，太陽不再令人難以忍受，折磨著心靈和身體，而濕度也是可以忍受的。在北部，按照台灣的標準，冬天真的很冷：10 度，最高 11 度，並且伴隨許多降雨。寒風刺骨是最佳寫照。北部也經常出現颱風警報，有時颱風帶來的風暴席捲該島，導致第二天停電，甚至相關部會首長要為此辭職。

島上的霧霾也嚴重，尤其是冬天，並且從南到北都是如此。人們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廠的廢氣排放，穿過台灣海峽對台灣造成污染。台灣海峽最窄處只有約 130 公里寬。但是，每天在台灣城市裡穿梭的成千上萬輛機車，確實對氣候造成了傷害。因此，早在病毒大流行之前，道路上就已經出現了口罩。在高雄，老年人通常在不注意交通號誌下前往目的地，這可能是儒家社會對老人的特殊尊重。顯然，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在路上的通行將越來越自由。

空污排放問題是台灣與隔壁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眾



多緊張關係的問題之一。對台灣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自家門口的危險因子，是一個邪惡的鄰居。正如席勒所言，虔誠的台灣人無法安居樂業，因為有著中國的威脅。這場戰鬥聽起來像是聖經中對大衛和歌利亞之間決鬥的描繪：小台灣必須自衛以對抗大巨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確實是如此。但權力之間的失衡並不總是這樣。在毛澤東從中國的內戰中取得勝利之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陷入了長達兩年半的混亂。在這段期間，台灣成為兩個敵對關係中的強者，台灣的領導人誓言要奪回祖國。毛澤東的冒進思想奪去了無數生命，據說在 1958 年至 1962 年，一場將中國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大躍進」期間，有高達 3,000 萬人死於飢餓。隨後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又再次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估計有 2,000 萬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艱難生存的同時，台灣則發展成為亞洲的強國之一，經濟產能爆炸式的增長，空前繁榮。

在此期間，我們造訪的高雄成為了島上的主要生產中心之一。Joe Studwell 在其著作《亞洲如何運作》（2013 年）一書中，描述了自 1980 年代以來被稱為「老虎經濟體」的韓國、日本和台灣，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空前的成功。Studwell 將這個過程描述為三個階段：土地改革是第一階段，通過分配更多土地，讓農民大幅增加生產力。此外，每個人也都享有私有財產的保護。如此一來，

每個人都有能力進入市場驅動的經濟。在這個微觀層面上的成功，導致了生活水平的適度改善。第二階段是使所有人有機會接受教育，而第三階段是讓他們有資格進一步擴大經濟。教育是社會進步的基礎，這一觀點仍然反映在今天的東亞社會中。安德魯白天教的學生，在上完八、九節課後，下午還要去對街最近的補習班，並且在那裡完成他們的家庭作業，甚至接受了他們還沒在學校學到的科目提前輔導。年輕人唸書的壓力是巨大的。然而，台灣這個貧窮的小島在短短幾十年內成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數位化國家，擁有良好的醫療保健和良好的教育體系，其成就同樣巨大。

正如我所說，經濟成功起飛的基礎是土地改革，再加上政府對基礎設施和農業核心元素（如化肥）的投資，為這一成功奠定了基礎。同時，根據 Studwell 的說法，金融的貸款只在國內發放，不允許資金流向國外。來自國外的投資變得不可能。投資者對經濟報酬的預期會減緩島上的增長。這一切都讓農村人口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做好了準備：紡織加工的時代開始了，也就是我在 T 恤上發現「台灣製造」標籤的階段。通過這種方式，台灣在全球化初期將自己定位為世界貿易的重要參與者。

台灣的迅速崛起，尤其歸功於其盟友美國的支持。在 1970 年代，美國支持將台灣變成芯片製造領航者的計畫。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因此在 1970 年代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的黃金時代，而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正在挨餓並成為政治清洗的受害者。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是中國內戰的兩個政黨中的強者——這是之後數十年，中國崛起後的今天所難以想像的。

此一歷史背景也造成了一個事實，即在過去一段時間來，當美國和台灣走得更近時，貿易才是最核心的問題，而不是保衛台灣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像現在一樣。儘管如此，台灣和美國之間曾經並且已經達成了防禦協議，美國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襲擊時保護台灣。就在二十多年前，美國派遣一艘大型航空母艦進入台灣海峽（譯按：1996 年台海危機時，美國第七艦隊穿越台灣海峽），就足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明，中國對台灣的恐嚇與野心不會成功。

1996 年左右，中國向台灣發射導彈，發生了一次前述的軍事干預。導彈飛越了南面高雄和北面基隆的航道。這些軍事恫嚇的導火線，是台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計畫訪問美國。由於北京將台灣視為中國的省份之一，共產黨當時試圖禁止各國邀請台灣的政府官員參加一些具有官方性質的外交活動。李登輝要在康乃爾大學就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成功發表演講，康乃爾大學正是李登輝本人過去在美留學的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李登輝訪美是一種侮辱，

是台灣計畫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北京片面升高台海的安全威脅。現在，25年過去了（正如我們將在本書後面看到的那樣），當美中台之間發生軍事衝突，誰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問題已經不再像1996年時那麼容易回答。

現在，兩國衝突的主要特徵仍然相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與台灣統一，以最終贏得內戰。北京認為2,300萬台灣人正在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是不可理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四處出訪，不厭其煩地強調民主是西方文明發明的制度，根本不適合東方人。尤其是民主國家賦予人民的自由，是習主席的眼中釘。正如我們所理解的，人權源於人的尊嚴，實際上是由兩個方面塑造的：公民自由和社會自由。公民自由，據我所知，追隨自由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包括：言論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投票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個人作為一個自由的個人，在社會中的天賦人權只有在個人能依據自由意志下自我實踐才能成功。社會參與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則是義務的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基本的醫療保險。只有給每個人相同的機會，民主才能平等地重視每個人。這種因果關係已被科學證明，就像如果你挨餓受凍，你就會生病是一樣簡單的道理。這也就是為什麼政治和經濟這兩個領域，是相互交織與相互影響的。



在民主國家，政治與經濟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在大的環境架構下變得更清晰：只有在允許言論自由、語言不受審查、沒有政治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情況下，他們才能最終開展經濟活動並且發展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國家是社會發展的引擎，而在專制國家，無論如何都是獨裁國家，沒有公民自由，這種發展就會停滯不前，因為它們與社會密切相關。在 1776 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中，人類被賦予了源自於自然尊嚴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人從根本上被賦予了與生俱來的尊嚴（生命）、公民權利（自由）和社會權利（追求幸福）。這三項權利缺一不可。中國統治者想要瓦解的正是這種聯繫。對習近平來說，人權在整體社會中，必須有所犧牲。有人認為，共產黨使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從而賦予了他們社會權利。作為回報，共產黨期望服從，也相信所有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治運動，都會取得同樣的成功。

習近平也努力在聯合國引入和實踐這種人權觀。這將是習近平這種獨裁統治者，企圖終結啟蒙運動、人文主義所提出的人權觀。放眼今天的中國，這一點變得很清楚：習近平越是讓社會步調一致，經濟就會承受越大的壓力。我們已經談到了習近平領導下對阿里巴巴、滴滴和民辦教育部門的意識形態攻擊。在這些成功的商業企業遭到打擊之前，共產黨一直堅持認為，沒有政治自由也能取得經

濟上的成功。現在它再次表明，獨裁政權不能給予經濟自由，因為遲早它會被經濟成功給攻擊和質疑。結果，這意味著習近平廢除了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走上了計畫經濟的道路。

習近平喜歡把他的反人權運動偽裝成反對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通過敦促中國尊重人的尊嚴，例如要求不為少數民族設立拘禁營，「西方」再次充當了對中國的殖民統治者。但是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過往的中華帝國一樣強大，再也不用任人宰割。習近平提出這樣的論點的方式讓人想起其他獨裁者。就好像普京所說，俄羅斯人（其他民族也是）對人權和政治有不同的看法，每一次「西方」要求俄羅斯實踐人權，都是一種新殖民主義。

當然，習近平和普京的說法都不是正確的。今天在聯合國有代表的所有國家都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因此，對人類尊嚴的承認，和由此產生的各種權利，在世界各個角落得到正式承認，無論在各自國家普遍存在哪些宗教，使用哪種語言，盛行哪種政治制度皆然。中華民國作為創始成員的聯合國，首次設法在國際上提出鞏固人權的法律，加以編纂並使其成為全球規範。像習近平這樣的專制統治者不關心人的尊嚴和人權，這是可悲的現實。更要強調的是，中華民國現在是台灣保障人權的先行者。在北京對香港和對台灣的強權政治中，「新殖民主義」的言論



也發揮了作用。共產黨用這個口號來證明它鎮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異議份子正當的。香港這片土地被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政府的一部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集體記憶中是一個「恥辱的世紀」。

然而，許多香港人知道，並且仍然支持英國殖民時期，賦予香港此一金融大城的自治權。在抗議中國企圖破壞香港自由的示威活動中，抗議者占領了該市的立法會，並在裡面懸掛了舊的殖民旗幟。這傳遞出明確的訊息：人們在英國的庇護下，比在北京的預期奴役下過得更好。在香港回歸前幾年，英國政府實施的民主改革，在 1997 年後被中共第一任行政長官立即廢除。從那以後，這座城市一直沒有平靜下來，只有新冠病毒大流行，才能夠暫時使眾多示威活動陷入停頓。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層似乎對人民的抗議不以為然，並仿效昔日他們懷恨在心的占領國一樣，「殖民」了自己。維吾爾人應該被「中國化」，這意味著他們應該像「漢人」一樣思考和生活，因為自古漢朝以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就自稱為「漢人」。如果永遠都達不到漢人的境界，就永遠是二等公民。北京的殖民主義實際上是歐洲殖民主義的復辟，過去歐洲殖民聲稱將基督教和醫療進步帶給窮人，征服了整個非洲大陸，結果卻奴役和殺害了人民。隨著中共對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香港人民的所作所